

玉渊杂谭

回望传统,是近年来一股社会思潮,到了教育体系,就反馈在读经热。最近,南方周末一篇读经少年来信再次引发了议论。这位读经少年算是一个鲜有的例子,因为母亲强烈抵触现行教育体制,就把10岁的他送进了专门读经而不进行任何其他学科教育的民间私塾。9年后的今天,少年越来越“焦虑”,因为他逐渐通过“私下”里的阅读发现,不问含义的背诵并非古代私塾的教育方式:读经之前,“必先习小学训诂”。而他的同学们,不少已经放弃了读经,精神陷入了迷茫。——他并没有看到所谓传统文化种子的萌芽。

虽属特例,我们仍旧从中看到了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今天的少年,被刻意“嫁接”了古典式私塾教育,实现了“文化”

上的穿越后,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危机?读经的初衷是好的,但如此读经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读经,可以分开来说。先说读,读不是坏事。朗读和诵读是一种语感训练,对孩子们语文素质的提高有很大好处。但凡文章,朗读和诵读效果会有质的不同,发展到背诵,就会有更大的飞跃。即便是成人,看到一些爱不释手的名篇名段,兴致所至愿意背诵下来,也会发现至此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吸收。但是和现在一些国学大师们提倡的死记硬背不同,个人比较认同在理解基础上的背诵这种观点。不求甚解,即使一时所谓“倒背如流”,但记忆也并不持久,因为这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训练。少年信中提到的放弃读经的同学们,

称他们之前所背诵的几十万字早已忘光。本人特注,古代学子毕生浸泡和厮混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在此没有参考价值。

再说经。朗读背诵既然有助于孩子们的语言文化能力,那读什么?国学大师们特别推崇四书五经,尤其是让幼儿园到小学阶段的孩子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这些旧时童蒙教材。他们的重点在“经”,也就是说,他们推崇的是“经”,然后才是强调读,让孩子们体内。客观说,古典作品的韵律性较好,适合启蒙期诵读。但是四书五经的部分思想并不适合于今天,作为成人对传统思想的关照、涉猎、研究可以,但让一张白纸的幼童接触这些,并不健康。

但国学大师们的说辞是继承传统文

化。无疑,今人和传统的断裂确实已深,但继承是扬弃,不是照单全收的接盘。

当我们读台湾作家,哪怕是林青霞这种玩票式准作家的作品,总能找到一种冲淡蓝籍的中国味,从中体会到一种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延续,这是令人钦羡的。而在大陆人写作中,处处可见欧化中文,中文被英文绑架得极其厉害,并且受网络文化影响,粗鄙化也很严重。对于一个国族而言,文学和写作失去了自身文化特色,语言发展受外来语言入侵,这并不是文化的幸事。

所以个人认为,在教育体系,尤其是少儿教育中,所谓接近和引入传统文化,应该偏重在文化和文学、礼仪和修养方面,而非落在思想塑造上。而我们的国学大师们,

其用心其实在后者。我总是忍不住叫他们“大师傅”,因为他们常给人半人半仙的感觉,故弄玄虚,言论缺乏逻辑,神话传统文化,把四书五经当成是救世法宝,意图普渡众生,有将传统文化宗教化的嫌疑。没有完美的主义和思想,更没有无懈可击的文化,这种对传统的“迷信”,本身就是可疑的。他们意图在孩子们尚未有判断力时,就让他们以诵读方式,让四书五经占据头脑,成为日后思想的“萌芽”,并不开明。也许凡事不到程度,便看不出其真正的性质,这位给南方周末写信的正宗读经少年自身的经历就向我们展示了不顾社会条件而盲目读经的恶果。不管什么样的教育,不问条件,大一统的洗脑,都是不可取,别忘,因材施教是谁提出来的呢?

也是水天一色之境,却无孤悬海外之感。因为这里是中国的自己的领海,船上船下都是自家的地方。

南海

和船长蓝明华紧紧地拥抱之后,看着他和兄弟们鱼贯登船,一声汽笛长鸣,海洋六号科考船又起航大洋了!和蓝船长拥抱时,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句,“路经南海,千万小心!”

朝胜好水,儿时到家乡淮河偷偷地游泳,妈妈端着饭碗到河边找,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游向对岸,喊也喊不回来,气得妈妈把饭碗都摔了……

后来在汉江边当兵,汉江直接就是铁道兵的“澡堂子”,夏天从地下水班满身的泥水,到了江边一头就扑了下去……

再后来,就有点牛了。万里走单船,随我国科学考察船“海洋六号”到太平洋科考,一猛子就是四五十天。那时,才明白什么叫水天一色,什么叫孤悬海外。没敢下水,因为一旦离船就算拜拜,只有那几十米的船上甲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船下的就是公海,深不见底暗流汹涌……

值得骄傲的是,朝胜也曾浪迹中国最大最深的海域南海。那是前年,随海洋六号到南海为我国首台大型4500米无人深潜器“海马号”做验收实验。南海位于西沙、南沙之间最深的海域可达4500米以上,这种深度堪称蓝水。也是水天一色之境,却无孤悬海外之感。因为这里是中国的自己的领海,船上船下都是自家的地方。南海,除了天高点、水大点,就归属感而言,与当兵时的汉江、少年时的淮河并无不同……

在船上的监控室里,通过深海视频看到了海马号缓缓地坐在了那4500多米的海底,操作手操纵了4500米以下的海马号,放生标、取样品、调角度、收网箱,准确灵敏如手使指……能够研制如此大型的无人深潜器,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白天和来自全国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几十名顶尖的海洋科学家海阔天空神聊,晚上和船员兄弟们忙里偷闲地钓鱼烹制品尝海鲜,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尝了一口之后,含着泪说了句,“尼玛,吃了半辈子的海鲜只能叫做海产品”。想想,那是怎么回事!

通过船上的微信,朝胜知道海洋六号在南海稍事停留避风之后直挂云帆济沧海,已经顺利通过巴士海峡,掠过关岛长驱大洋了!

在南海躲避台风时,蓝明华船长发来了一张照片,在直升机甲板上,蓝明华率领着刚刚成立的海洋六号青年突击队正在宣誓。这是海洋六号科考船的一个优良传统,每次出大洋都会成立一个青年突击队,平均三出头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基本都是科考队和船员的骨干,我随船两次出海,都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青春活力和浩然正气!

海洋六号在南海科考多次,西沙、南沙、黄岩岛、钓鱼岛等海域,海洋六号以前都是常来常往。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这些海域就开始紧张起来了,海洋六号的首任船长何发光、前任船长孙燕鸣、现任船长蓝明华,都和我讲过很多在南海边缘进行科考的故事。大海之中,因为行驶和气象等方面的原因,有时船只顺流飘到别国的海域或者码头避难,大家都是踏海的同行,一般都会理解和接纳,有时还会给予相关的物资补给。

可是近年来,南海边缘的摩擦不断,海洋六号科考船在自家海域开展正常科考时,居然出现了拖网被砍断、螺旋桨被渔网缠绕等恶性事件,在南海边缘科考的危机感越来越大了,青年突击队面对国旗举起右拳的誓词,其声音应可直达海底!

尽管如此,海洋六号在南海的科考,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媒体经授权正式披露,2015年3月,海洋六号优选南海珠江口盆地西部海域进行了验证性调查,使用自主研发的“海马”号4500米级非载人遥控潜水器,首次发现了海底巨型活动性“冷泉”。因为这是“海马”号研发成功后第一次应用于海洋地质调查,故将该“冷泉”命名为“海马冷泉”。科学家首次公布“海马冷泉”最新成果,展示中国发掘“可燃冰”已经迈出重要一步。

其实,关于“可燃冰”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多年,国家出于保密的考虑,一直没有过多公布。因此,海洋六号科考船在南海也默默当了几年的无名英雄。

有名无名英雄在,南海就是英雄的海!

朝胜 1611419167@qq.com

品筑春秋

魏晋南北朝:凿石造像的绝响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中国进入了三国时代。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一共361年,这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战乱频生、兵连祸结,和平的日子少,打仗的时候多。

因为世事无常,人命贱如蝼蚁,故而,从东汉开始萌发的佛道两教在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统治阶级大力推广,普通百姓也笃信不疑。这一时期,宗教类建筑得到了飞跃发展,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各种石窟。

中国的四大石窟全部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历代均有修缮、新增。最早开工的是敦煌石窟,开凿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这一年,王羲之在浙江绍兴兰亭呼朋唤友、曲水流觞,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30多年后,后秦政权在甘肃天水开凿石窟,是为麦积山石窟;北魏拓跋氏立国之初,就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在新都南麓开凿龙门石窟。这四大石窟成了那个时代崇佛、信佛最直接的证据。

很多人心中都先入为主地认为,石窟就是凿山为室、雕刻佛像、绘制壁画,属于雕塑、美术范畴,和建筑没有关系。事实并非如此,敦煌的九层高楼就是木结构建筑,飞檐翘角、气势恢宏;莫高窟第148窟壁画,反映的是盛唐时期大型寺庙建筑群的风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殿多采用庑殿顶,配殿多采用歇山顶,这和明清的建筑屋顶等级制度都是一样的;莫高窟第359窟壁画,反映的是中唐时期的阁楼建筑形象;六角攒尖顶,瓦上有小吻兽,两门



四窗对开,走廊外加护栏,须弥座式收腰的基座。跟今天常见的亭子非常接近了。

此外,石窟内部经常可见仿木结构的坡顶、斗拱、梁柱,这些虽然都是石构件,但也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木结构的样式。除了石窟以外,佛塔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

佛塔,又称“宝塔”,其名源于印度梵文Stupa(窣堵波),也有人翻译为“浮屠”,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古印度的佛教寺庙,最初都是以佛塔

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在佛塔周围。佛教东传中国后,最初的寺庙格局延续了这个传统。只是到了隋唐以后,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雄宝殿才逐步取代了佛塔的中心位置,成为寺庙最关键的建筑物。

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是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该塔始建于北魏正光4年(公元523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

嵩岳寺塔为砖砌密檐式佛塔,塔身为十二边形(中国孤例),全塔高39.8米,底层外径10.6米。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用叠涩平座将之分为上下两段,在四个正面开

了贯通上下的塔门。下段的其余八面都是素面平砖,没有加以装饰。上段是整个塔装饰最集中的地方,分别装饰壶门、狮子、火珠垂莲。塔刹用石块雕刻而成。刹座是巨大的仰莲瓣组成的须弥座,须弥座上承托着梯形的七重相轮组成的刹身,刹顶是一个巨大的宝珠。

嵩岳寺塔外观匀称、秀丽,总体轮廓呈现平缓的抛物线形,正是由于它的设计科学合理、建造严谨认真,故而能够一直保存至今,历经地震、兵火等天灾人祸,都安然无恙。

因为列朝列代的崇佛之风佑护,南北朝时期的石窟、佛塔,很多都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的宝贵历史财富。但是,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规划、宫殿建筑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战乱频繁、兵火不断,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南北朝时期的任何宫城遗址。

这里要提一个著名的建筑大师:北魏都城洛阳的总设计师蒋少游。

蒋少游,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北魏著名的建筑家、书法家、画家和雕塑家,多才多艺,天下闻名。

蒋少游年轻时,作为刘宋王朝的亡国奴,被鲜卑族的北魏政权俘虏到平城(今大同)服役,因为才华出众,受到了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赏识,当上了朝廷的小官。孝文帝一心要汉化改革,去除鲜卑旧制,蒋少游坚定地站在了皇帝一边,为其制定褒衣博带服装样式,并推行到全国。

公元495年,孝文帝将北魏都城从平城迁移到洛阳,蒋少游摹仿中原传统文化设计,营建北魏新都。在蒋少游、丘穆陵

影像空间

小镇青年的诗意

文·管军

于时空交错,现实与梦境更迭的布局设计,使得影片在结构上稍显复杂。简言之,是一个时空穿梭的超现实故事,主人公陈升在现在、过去与未来同时存在的时空中与潜意识中的人物在一个名为荡麦的地方相遇,这些相遇,串起了主人公前半生,不露痕迹地向观众传达了人生的无常,虚妄和无奈。

一段时间以来,摄影机喜欢将镜头对准都市的灯红酒绿、热闹繁华,譬如北京东三环的夜晚川流不息的车河和旁边高耸的国贸三期,或者交错着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等摩天大厦的外滩,似乎这才是当下年轻人应有的生活。而留驻在县城或者小镇里的青年,他们每天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似乎没有人关注。就像电影里表现的,伴随主人公的只有破落的迪厅球灯、肮脏的台球桌、油腻的修车厂和窗外不知驶向何方呼啸而过的列车。

似乎在大城市里,一切都如同按了快进键一样在向前赶,而在小城镇,时间仿佛佛是停滞的。这也是影片想表现的关于时间的意象。影片有一段40多分钟的长镜头,发生在荡麦,类似于虫洞或任意门之类的存在,这里的时空都发生了扭曲。主人公陈升要寻找被送走的侄儿卫卫,在这里却遇到已成青年的卫卫;在理发店遇到了和自己妻子同名同貌的姑娘,甚至,她们去看海的愿望都一样,于是,她跟她讲述了自己在服刑挖矿时,见到被重金属污染而成蓝色的水湾,安慰自己,也许大海就是这个样子吧,也许有一只粉红色



《路边野食》是一部没有票房企图和野心的文艺片,国内院线排片仅10天,且大部分影院每天只有一两场。作为文艺片,自然不具备一般商业片强大的卡司、炫目的特技和引人入胜的故事,甚至没有特别完整的情节。但仍凭其特有的气质和艺术表现手法,成为近期影迷关注的焦点。

故事发生在贵州黔东南,这种西南小城苍郁的森林、蜿蜒的山路、缭绕的云雾孕育出一种野性的神秘,这里发生的故事,似乎也散发出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气息。而且这里的方言有自己的韵律和味道,即便没有经过声台形表的科班打磨,自然说出来也似乎具有天然的戏剧性。

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表示不是很懂,其实影片原本就没什么情节,由于导演关

袁世凯的「揖让」闹剧

文·丁辉

中国乃“礼仪”之邦,所以,即使“狼子野心”的篡逆者,当临九五之际,也有所谓“揖让”之礼。即如废汉献帝而自立的魏文帝曹丕,当逼宫之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废献帝无奈,下诏“追尊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曹丕却又假模假式,一让,再让。一则曰自己“德薄恩寡”,不堪大任,再则曰自己“德非虞夏”,请别求大贤。做足了“谨慎诚恐,不敢闻命”的戏码,方以“天命不可以辞拒,群臣不可以无主”,登坛受禅。一副“勉为其难,无可如何”状,千载而下,犹让人禁不住掩口葫芦。

袁世凯复辟已是箭在弦上之时,袁的老师张謇曾戏语袁:“大典成立,当举大总统为皇帝。”袁假谦曰:“以政教合一论,万世传统皇帝,当属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以革命排满论,则皇帝当属朱家后人延恩侯朱煜勋,可以当之。”张謇曰:“然则孔族长繁锦,朱总长启钐,皆可登九五;朱友芬(时京师专治偏头痛的郎中)、朱素云(时一擅演风骚女子之名伶)亦可奉为至尊也。”这本是滑稽笑谈,岂料稍后袁氏称帝时竟有人据此议定“揖让”之礼,以天下悠悠之口。

据辛亥元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其时议定的“揖让”凡“三让”:第一次“揖让”的对方是宣统皇帝。袁氏“智囊团”筹安会“骨干”刘师培等认为,“大总统接受政权,得之满清,由清廷直接让与,而非得之民国,今国民既不以共和为然,大总统宜还帝权于移交之人”。第二次“揖让”的对方为朱元璋后人延恩侯朱煜勋。此既合“排满”革命宗旨(孙中山亦曾于临时政府成立的1912年率文武百官亲谒明孝陵),又表大公无私态度。第三次“揖让”的对方是孔子后人衍圣公孔令贻。衍圣公为中国数千年道统之象征,此“让”尤显大总统决决大度。袁氏智囊团的如意算盘是:“三揖三让礼成,大总统再受国民推戴书,御帝位,世无间言矣。”

“揖让”事近游戏,本不需担心“受让方”认假作真,然袁氏徒党还是担心万一,于此做足功课。比如曲阜地方忽现针对孔令贻的控案数十起,皆为袁氏徒党所为,目的自在搞臭孔令贻,为“揖让”之礼预作准备。

清雍正年间,为宽裕汉人,诏封朱明皇帝朱之愚为延恩侯,传十二代至朱煜勋,光绪十七年袭爵。民国后,朱煜勋被取消爵位,袁氏复辟时,朱煜勋只是一月薪五十大洋的明陵保管员,打死他也不敢再做“复明”的春秋大梦。筹安会诸人竟抬出这样一个朱明后人装点门面,和当年曾静竟欲联合岳岳后人、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同一想入非非也。

包括刘师培在内的筹安会诸人可能自己也感觉到如此“揖让”,迹近荒唐,又议定大总统接受国民推戴书有两项办法:一,让而不揖,无对象也。可由大总统退还推戴书三次,始受帝位;二,让而且揖,有对象也,则前议宣统、延恩侯、孔子后裔皆不成问题。所幸袁氏最终采用的是无对象的“让而不揖”对策,方使得此场闹剧在收场时尚不至于滑稽。

黄潜《花随人圣庵忆》有“拳术与政术”条,谓政术与拳术通,唯“稳、冷、狠”三字。袁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故称)于此三字足以当之,遂成就其前半生立于不败;惜晚年于“冷”字欠缺功夫。盖人一臻老境,私欲转深,反易头脑发热。袁氏晚年不能安于冷,仅观其“揖让”闹剧,竟无异沐猴而冠,宜其取败也。海外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的评价最为中肯:“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